

2012年度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重大项目

传媒安全研究

CHUANMEI ANQUAN YANJIU



李舒东 等◎著

随着国际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传媒的作用高度发达,
由传媒引发的安全问题也日渐凸显。
如何利用大众传媒确保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和群体安全成为亟须探讨的课题。



人民出版社

013068457

2012年度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重大项目

G206.2
263

传媒安全研究

CHUANMEI ANQUAN YANJIU



李舒东 等◎著



G 206.2
263

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675962

责任编辑:卓 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媒安全研究/李舒东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ISBN 978-7-01-012398-1

I. ①传… II. ①李… III. ①传播媒介—关系—国家安全—研究

IV. ①G206.2 ②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3880 号

传媒安全研究

CHUANMEI ANQUAN YANJIU

李舒东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20 千字

ISBN 978-7-01-012398-1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传媒安全的研究对象及意义	(1)
第一节 传媒安全的定义	(1)
第二节 传媒与传媒安全的关系	(4)
第三节 传媒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础	(10)
第四节 传媒安全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18)
第二章 国外传媒安全实践	(22)
第一节 俄罗斯传媒安全实践	(23)
第二节 美国传媒安全实践	(33)
第三节 英法德传媒安全实践	(43)
第四节 国外传媒安全实践带来的启示	(50)
第三章 中国传媒安全现状与研究	(55)
第一节 中国传媒安全现状	(55)
第二节 中国传媒安全个案研究	(67)
第四章 传媒与国家安全	(76)
第一节 传媒影响国家安全领域的主要表现	(77)
第二节 确保国家安全议题的基本方式	(88)
第三节 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的业务缺陷	(97)

第五章 传媒与社会安全	(103)
第一节 传媒与民生、社会公正	(103)
第二节 网上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	(110)
第三节 网络时代的文化衍生及冲突	(116)
第六章 传媒与文化安全	(121)
第一节 文化与传播	(121)
第二节 传媒与文化渗透、文化融合	(128)
第三节 传媒文化市场的安全隐患	(138)
第七章 信息科技与传媒安全	(147)
第一节 信息科技与传媒全球化	(147)
第二节 传媒信息安全策略	(153)
第三节 传媒信息安全的风险管理	(161)
第八章 传媒安全表现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68)
第一节 传媒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论证	(168)
第二节 传媒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175)
第三节 传媒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操作	(189)
第九章 传媒安全保障体系	(196)
第一节 国外传媒安全战略保障	(196)
第二节 国外传媒安全法律保障	(205)
第三节 国外传媒安全制度保障	(212)
第四节 中国传媒安全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221)

第十章 传媒主体与传媒安全	(229)
第一节 不同传媒主体在传媒安全中的角色定位	(229)
第二节 传媒主体的安全责任意识	(236)
第三节 传媒主体的安全预警与防控	(246)
第四节 传媒主体的安全危机处置	(250)
参考文献	(255)
后记	(269)

第一章 传媒安全的研究对象及意义

第一节 传媒安全的定义

本书中使用的“传媒”是一个宽泛的概念。194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战后公共图书馆的准则》一书首次使用了“传播媒体”这一概念,简称“传媒”。传媒,在学术界泛指传播信息资讯的载体,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如西方经常用的“媒介”这一概念。“新闻媒介”(news media)或“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与“传媒”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该概念现在已成为各种传播工具的总称,包括电影、电视、广播、印刷品(书刊、报纸)等。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网上媒体亦成为一种新形式的传播媒体。概括起来,目前存在的传媒形式主要有五种类型:(1)纸媒,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等,其传播方式是在纸上传播文字和图片;(2)广播,它是用电波的形式传播声音;(3)电视,可以传播图、文、声音和影像,不过由于它画面移动的特点,传播图和文的效果并不好,传播声音和影像的效果却非常好;(4)互联网,它是个综合性的多媒体平台,用它来传播文、图、声音和影像效果都不错;(5)移动媒介,如手机、iPad,它将是覆盖人群最广的一种媒体形式,传播成本比较低廉,能最快速、便捷地传播信息。

传媒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原始传播方式到手抄传播方式、印刷传播方式、电子传播方式。在书写工具问世以前,信息的传递是通过语言、手势、图记、烟火等方式进行的,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活字

印刷术的发明,特别是金属活字的应用,为近代报纸的产生创造了技术条件,促进了传媒的发展。17世纪是近代报纸的开创时期。19世纪初,随着近代报纸发展的需要,法国人哈瓦斯(Charles Louis Havas)于1835年首创为报纸提供新闻的通讯社。20世纪初期,无线电广播作为新闻传播工具的新形态出现。1920年美国匹兹堡西屋电器公司的商业广播电台开始播出新闻。1936年,英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播送电视节目。广播、电视利用现代化的电子技术传播新闻,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传播迅速,范围广泛,问世几十年来,其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报纸。

各种形态的传媒工具,都有自身的优点和不足,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各种传媒工具的优势融合起来。新闻传递和报纸生产技术的电脑化,简化了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的程序,缩短了空间距离,节省了时间。经济发达的国家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将信息中心和分散在千家万户的电脑终端连接起来组成新闻传播网络,可以直接传送报纸版面。读者不必通过邮递就能看到输入信息中心的报纸,并且把认为需要保存的版面用连接在终端器上的打印机印在纸上。新闻传播工具出现后,新闻传播成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传播方式不断变化,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效果也越来越强。大众传媒能够最大限度地超越时空的局限,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日益显现出在文化传递、沟通、共享方面的强大功能。具体来说,传媒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基本功能:

1. 获取与传递信息。这是传媒最基本的功能。如看《新闻联播》,获取信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转发信息,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
2. 文化传承功能。传媒能传播历史文化、前人的知识与经验,记录同时代人的探索与创新。
3. 监测社会环境,舆论监督。此功能在新闻传媒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通过对某一事件的曝光,揭露假恶丑,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发展。

4. 协调或混乱社会关系。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有时依赖传播双方或各方达成理解和共识得以实现,有时通过民主的话语商谈将公共领域与权力系统勾连,进而促进现代民主的构建,否则,可能造成社会的混乱。

5. 娱乐休闲功能。在娱乐产业中,媒体是主干,如电影、电视、广播、网络等。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体相比,电视娱乐成为强势娱乐形态,如《中国好声音》、《舞出我人生》。正因为如此,从世界范围看,娱乐已成为传媒产业的动力。

传媒的各种功能决定了它与“安全”的联系。安全的概念一般是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人类整体与生存环境、资源和谐相处,互不伤害,不存在危险的隐患。安全是在人类生产过程中,将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人类的生命、财产、环境可能产生的损害控制在人类能接受水平以下的状态。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指出:“人们认为媒介是‘伤害’社会(引发冲突和失序)以及对社会有益的可能性(维持秩序和社会整合)”^①,有专家也提出类似观点:“引发各类影响安全的负面事件是媒介的自发属性,同时维持社会秩序也是媒介的‘有益’属性。”^②可见,传媒安全是一个互动概念,至少涉及主客体双方,具有“伤害社会”与“有益的可能性”双重属性。传播者的传播对受众、社会或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伤害,或解除危险、促进安全。举“有益的可能性”的案例: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人类传播史》中写道,罗斯福的“炉边夜话”通过广播使美国人民不再恐惧法西斯的威胁,为美国的公共政策争取到了舆论的支持,这可以被看作是大众媒介发挥安全功能的实例。又如1991年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后,各媒体随即形成强大的国际舆论,要求萨达姆政权立刻撤兵。谴责侵略的强大的国际舆论,形成巨大的震慑力。在这

^①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② 何镇飏:《关于媒介安全的思考》,《当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29—31页。

种震慑力的推动下,伊拉克政权陷入孤立处境,联合国也通过多项决议,对萨达姆政权进行一系列制裁。这是传媒维持社会秩序、促使外交转危为安的一个表现。而“毛发酱油”、“食盐疑似含有辐射物质疑团”、“海南致癌香蕉”等轰动一时的新闻,就其个案本身属于真实信息,但是经过媒体的放大与高频次报道,它的负面传播效应呈几何式增长,最后造成了社会恐慌和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安全性问题。

由于我们经常忽视传媒安全的重要性,忽视从国家、媒体等层面整体部署和防御,我们的传媒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或潜在的、短期的或长期的传媒安全隐患,抗风险能力较弱。正因如此,对传媒安全的研究尤为重要。传媒安全包括多个层面,主要有: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民族安全、外交安全、经济安全、群体安全等。传媒安全理念或安全价值观,是安全方面衡量利与弊、好与坏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思想。对于传媒机构来说,它是一套系统;对国家来说,它既是系统更是战略,应当包括核心安全理念、安全方针、安全使命、安全原则以及安全愿景、安全目标等内容。传媒安全理念绝非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国家战略管理的核心要素。

第二节 传媒与传媒安全的关系

无论在国内事件还是在国际事务中,专业的媒体机构总是先于公众得知事件的缘由和进展,可以快速作出不同的传播反应,采取相应的态度,或中立,或采取强势的传播,表达观点,引导舆论,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有专家评论说,媒体正以“某种我们无法界定的方式逐步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无法界定”中难免包含潜在的或现实的危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安全性不是传媒的先天属性,而是监督和管理的要求

首先,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到这样一个现象:任何一个媒体都不可能游离于政治和资本构建的权力空间之外。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传媒的发展,必然还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在西方国家,政府控制着少数媒体,比如美国政府控制的专门从事海外新闻服务的“美国之音”(VOA)。美国曾曝光布什政府每年投入约8000万美金收买有关媒体记者为其执政作宣传的事件,这种严重违反新闻职业准则的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国际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识别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传媒来完成的,所以传媒不仅充当一般的通道和中介,同时也具有特定的使命,传媒不仅仅只是传播者,更是渗透者、塑造者,这就决定了传媒安全的客观存在。

仅以“美国之音”为例。我们在“美国之音”自身的定位中,就能看出自相矛盾的方面:它一方面宣称自己是“一个一贯可靠的、权威的新闻来源,播送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全面”(VOA will serve as a consistently reliable and authoritative source of news. VOA news will be accurat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但实际上,它又不得不承认“‘美国之音’将代表整个美国,而不是美国社会的个别阶层。所以,‘美国之音’将平衡、全面地反映重要的美国思想和体制”(VOA will represent America, not any single segment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will therefore present a balanced and comprehensive projection of significant American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美国之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隶属于战时的对外新闻局。1945年改组,隶属于美国国务院的国际新闻署。1953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设立美国新闻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美国之音”改属这一新机构。翌年,“美国之音”中文部随总部从纽约迁到华盛顿,1994年4月,美国政府再次改组国际广播架构,成立国际广播局,“美国

之音”又归属国际广播局。

既然“美国之音”反映“美国思想和体制”,它只能是美国官方的国际传播媒介,是美国进行境外渗透、实现其全球霸权的工具。从成立以来,“美国之音”从未放弃文化渗透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美国不愿意看到和接受日益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新一轮大规模文化渗透的目的就演变为极力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颜色,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可以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战略的《十戒》中看出这一意图。

《十戒》无不与传媒相联系,其实质就是美国政府对其媒体发布的实施纲要,也是相当完整、有效的一整套渗透战略。有学者认为,这是“以软刀子割头的战略”。利用传媒对华进行文化渗透,是西方资本主义一以贯之的战略。在当今,撇开漂在表层的信息技术的浮沫,美国推进使用互联网这一渗透手段,与近代西方列强在华大力发展传媒事业、办各类报刊从事欺骗宣传活动,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文化渗透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从传统传媒(纸质)到网络(无纸化)。其他途径如报刊、广告、电影、电视、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等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文化渗透、暗中输入西方价值观念的形式。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各大网络公司的负责人时公开表示,美国会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美国政府希望利用网络达到政府目的。目前,控制国际互联网的13台域名根服务器全部被美国所把持。美国以“文明”、“民主”、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传媒安全的主客体是相对的。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美国之音”作为美国传媒安全的主体,有效发挥“渗透、颠覆”作用,建台60多年来,在向外输出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经济模式,配合美国外交政策以及努力扩大美国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常常是小骂帮大忙。作为其传播客体之一的中国,已受到实质的或潜在的伤害。如果我们不

着手建立完备且强大的防御体系和机制、自觉有效的国际传播网络与体系,国家安全势必受到威胁。

二、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于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

在本书第六章中,将专门论述文化帝国主义,这里强调的是,媒介帝国主义只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国的贝尔纳·瓦耶纳(Bernard Voyenne)教授在其《现代新闻学》中,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西方政府对媒体的控制目的,他说:“所有的政府都是以主权原则为理由,要对新闻的输出或输入进行独家控制。”另外,通过美国学者席勒描述美国政府与美国媒体的关系一段话,我们就能把握其管理的实质。席勒精辟地指出:“美国联邦政府不仅密切地卷入文化侵略的过程,而且还委令国防部直接间接控制之。所谓直接,国防部统筹拟定全国广播政策,决定频率频道的分配;所谓间接,各大广播关系企业皆承接了大批的国防军事合同。美国的传播势力所以能够所向无敌,完全是直接拜赐于政府既定的军事外交政策。反之,传播则成为军事和外交的利器与急先锋,相辅相成,互为结果。”^①这一点,在美国对媒体的管理上尤为突出。如在对外传播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制定了对媒体的指导性意见《十戒》,简要而明晰地告诉媒体在对外传播时,应达到怎样的

^① 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目的与效果,应注意什么。再如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美国政府又及时调整传播战略。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网络自由讲演。她表示,美国国务院在使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发送“Twitter”信息后,还准备推出中文及俄文的“推特”账户。美国还将花费2500万美元,用来保护网络作者,帮助他们突破网络限制。“美国之音”停播华语与“Twitter”被美国政府热捧,此消彼长之间,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内部宣传资源的一种调整。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正日益重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文化渗透影响力,希望借此加强对中国的宣传攻势。与美国比,中国对外传播所起的作用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相符,所以才会出现“西强东弱”的现象。

三、“文化孤立”与“中国危险论”也是潜在的不安全因素

从哲学上说,孤立,本质就是一种困境,困境意味着不安全或危险。余秋雨在《中国处于“文化孤立”之中吗?》一文中,强调世界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他举例说,他曾听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人说:“每个初次来华的西方人都会有点吃惊,为什么没来之前对你们有那么多误会?有可能,你们的宣传方式造成了某种误会孤立……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是否真的“孤立”了,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按照西方著名学者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的观点:“文化成为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很大。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逆差还是很大的。深究其因,有意识形态的对立,西方故意的阻隔,也有我们传播的固有弊端。我们的传播方式、渠

道、语言都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并未向外传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导致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在整体上仍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①文化领域的国际斗争必将愈演愈烈,舆论主体的多元化易引起不安全性。中国处于文化霸权的威胁之中,防止或破解危险,中国传媒重任在肩。

与“文化孤立”相伴随的是“中国危险论”。众所周知,目前全世界90%的信息是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生产和传播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只是中转站。“中国危险论”的炮制者罗斯·芒罗(Ross H. Munro)通过媒体发布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西方媒体不仅对该文的许多观点重复引用,而且还捕风捉影、火上浇油,对“中国危险论”的形成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看法。“中国危险论”的传播对中国就是一种非常有害的攻击,本质上服务于美国一贯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这种政策包括硬遏制和软遏制两方面。硬遏制主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软遏制主要依靠舆论和道德约束力。媒体的舆论引导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作用由此凸显。西方媒体把中国说成是一个对全世界具有威胁性的国家,一是破坏中国的国家形象,二是企图利用国际舆论对中国施加压力,改变中国的政治立场,达到对中国实行软遏制的目的。消除“中国危险论”,消除西方媒体对中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媒体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应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力和调控力,加强并完善报道议程设置的主动性并建立有效机制,运用各种文化产品,传播中国声音,逐步消除国外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的不良影响。

四、间谍活动的无孔不入

2013年2月,美国一些媒体罔顾事实,把矛头专门指向中国,指责

^① 廖兰:《中国遭遇“文化孤立”了吗?》,环球在线,2006年12月29日。

“中国网络黑客”。白宫接着发表题为《减少美国商业秘密遭窃的行政战略》的报告,19个案例中16个涉及中国,其媒体与政府的“双簧戏”的默契程度让人吃惊^①。有意思的是法国《论坛报》的文章称,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明者,也同样是网络黑客和政府网络间谍行为的始作俑者,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和网络间谍行为毫无关系。尤其是2013年6月以来暴露的“美国棱镜事件”,也提醒人们正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犯。这一场舌战给我们的启示是,各国网络间谍的博弈会长时期存在,安全至关重要。

第三节 传媒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传媒安全观

(一) 马克思主义传媒安全观创立时期的观点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只有及时了解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进而保障国家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监督是传媒安全功能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媒体就好像“瞭望哨”一样,有着监测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媒体的监督职责。马克思认为“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恩格斯也说,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②。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报纸是最主要的传媒载体,他们提出的媒体监督,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当权者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以争取新闻出版自由,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

^① 参见《环球时报》2013年2月22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55页;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80页。

发展。在新闻出版自由前提下的媒体监督,通过监督减少招摇撞骗发生的可能,让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助于净化社会环境,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传媒安全理念的实现。

(二)马克思主义传媒安全观革命建设时期的观点

列宁经常提起“行动自由,批评自由”的原则,认为“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①。在批评自由的基础上,列宁又提出:“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也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②他并不担心说真话被敌人利用,在十月革命前夕就此写道:“用美好的词句掩饰令人不快的真相,对无产阶级事业来说,对劳动群众的事业来说,是最有害最危险的事情。不管现实如何令人痛心,必须正视现实。”^③一个党的宣传需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而一个社会的传媒安全更是要以真实作为依托。

毛泽东的党报理论对今天的传媒安全也有许多借鉴意义。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在1950年4月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和1954年7月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强调报纸批评的重要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人民日报》率先改版,带动了全国新闻界的改革,宽松的环境保证了传媒安全和社会稳定,但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双百”方针没有得到贯彻。

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概念。1959年6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谋寡断……要一下子看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33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